



稻作 陶器 和都市的起源

主编 严文明 安田喜宪



文物出版社

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主编 严文明 安田喜宪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0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张庆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严文明 安田喜宪 主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1

ISBN 7-5010-1211-3

I. 稻… II. 严… III. ①稻-农业史-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陶器(考古)-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③城市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253 号

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严文明 安田喜宪 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3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211-3/K·501

The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Pottery and Cities

Editor in Chief: Yan Wenming and Yasuda Yoshinori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000

目 录

写在前面 严文明 安田喜宪(1)

总论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严文明(3)

东亚稻作半月弧与西亚麦作半月弧 安田喜宪(17)

稻作与陶器的起源

湖南道县玉蟾岩 1 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 袁家荣(31)

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 张 弛(43)

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 郭瑞海 李珺(51)

日本列岛晚冰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陶器起源 堤 隆(65)

长江中游 7000 年以前的稻作农业和陶器 裴安平(81)

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 邹厚本 谷建祥 李民昌
汤陵华 丁金龙 姚勤德(97)

水稻的双峰乳突、古稻特征和栽培水稻的起源 张文绪(115)

从 DNA 看四川盆地的稻作起源 佐藤洋一郎(129)

都市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赵 辉(135)

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王毅 蒋成(143)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和石家河聚落群 张绪球(167)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属城市文明吗 冈村秀典(181)

试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变迁与古史传说 高崇文(189)

CONTENTS

Preface *Yan Wenming, Yasuda Yoshinori* (1)

Introduction

The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Pottery and Cities *Yan Wenming* (3)

Rice Agricultural Crescent in the Eastern Asia and

Wheat Agricultural Crescent in the Western Asia *Yasuda Yoshinori* (17)

The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and Pottery

Rice and Pottery 10,000 BP at Yuchanyan, Daoxi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 *Yuan Jiarong* (31)

Pottery and the Silicified Rice Remains in Wanni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 *Zhang Chi* (43)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nd Pottery Making in Northern China as seen at

the Nanzhuangtou Site *Guo Ruihai, Li Jun* (51)

Adaptive Strategies in the Late Glacial Epoch and the Origin of Pottery

..... *Tsutsumi Takashi* (65)

Rice Agriculture and Pottery Making 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7,000 BP *Pei Anping* (81)

Findings in the Paddies of Majiabang Culture at Caoxieshan, Jiangsu Province

..... *Zou Houben, Gu Jianxiang, Li Minchang,*

Tang Linghua, Ding Jinlong, Yao qinde (97)

The Bi – peak – tubercle Structure of Rice, Features of Ancient Rice and the Origin

of Rice Plantation *Zhang Wenxu* (115)

DNA Testing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Rice Agriculture *Sato Yoichiro* (129)

The Origin of City Civilization

An Essential Issue in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o Hui* (135)

Discovery and Preliminary Studies of the Sites of Early Cities on the Chengdu Plain
 *Wang Yi , Jiang Cheng* (143)

Sites of Prehistoric Cities 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Shijiahe Settlement *Zhang Xuqiu* (167)

Is Qujialing – Shijiahe Culture a City Civilization *Okamura Hidenobu* (181)

On the Evolution of Primitive Cultures 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Legend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Gao Chongwen* (189)

写在前面

近年来,在中国发现了一些年代很早的稻作遗存、陶器和古城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日本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发现了很早的陶器,有的地方还有较早的稻作遗存。在这期间,中日两国学者在稻作起源和都市起源问题上已经进行过多次富有成果的合作。由于这些工作多数是分散进行的,相互间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我们想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便有机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对近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作出评价。1997年春季提出动议,秋季正式确定计划并对有关学者发出邀请。1998年3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京都市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名为“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以外,还有美国的学者参加。

会上提交的论文很多,除收入本书的以外,还有不少论文因限于篇幅、或与本书的主题不尽相合、或者考虑另行发表,只好忍痛割爱。有些论文只提交了较详细的纲要,发言后并没有完成文稿,因而也无法收入。不过对于各位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们是衷心感谢的。

在会议进行到后期的3月21日,由安田喜宪主持大会对公众进行讲演。会上分别由梅原猛作了题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发现》、严文明作了题为《中国稻作和陶器的起源》、徐朝龙作了题为《中国都市文明的起源》三个报告,听众十分踊跃。京都出版的《历史街道》月刊专门为会议出版了专号,不少报纸也刊发了会议的消息。应该说这次会议是开得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会议的成果,我们商量先出版会议文集中文版,由严文明主编;然后出日文版,由安田喜宪主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准备选一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对于在会议期间给予多方面协助的日本国文部省CDE形成基础研究基金、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京磁株式会社,以及在出版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国文物出版社,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严文明 安田喜宪

1998年5月30日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严文明

今天我们邀请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农学家和环境考古学家等,聚集一堂共同研究稻作农业、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讨论的课题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有很多人研究、发表过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近年来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需要进行交流和讨论,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各位都是走在研究前沿的学者,一定有不少新的信息和高明的见解。为了便于讨论,我不揣冒昧地先讲一点基本情况和个人粗浅的认识,请大家不吝指正。

先说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在几种对人类文明有重要影响的粮食作物中,稻米和稻作农业的起源虽然很早就有人关心,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见解,但进入实质性的研究则是比较晚的,争论也是比较多的,只是近一二十年才有决定性的突破。过去一般根据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的基因多样化变异中心即起源中心的意见,认为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也有人根据野生稻和现代栽培稻主要产区分布的情况,认为起源于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后来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张德慈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提出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山地起源说,曾经有相当的影响。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中国浙江河姆渡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大量稻谷遗存,加上在马家浜文化和大溪文化中也有较早的稻谷遗存,学术界提出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①,后来被人们概括为长江起源说。事隔不久,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中都发现了更早的稻谷遗存,年代达到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是当时所知全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长江流域起源说遂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至于最近湖南玉蟾岩和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发现,则把稻作农业起源的年代提到了公元前1万年以前。在玉蟾岩遗址采集的木炭和陶片经过¹⁴C测定,年代分别为 $12540 \pm 230\text{BC}$ 和 $12860 \pm 230\text{BC}$,江西两处遗址的年代也差不多,比西亚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的年代还要早些。

为什么长江流域会成为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而不是在普通野生稻较多的华南或东南亚的某些地区呢?因为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那里冬季较长,食物比较缺乏,需要某种可以储存到整个冬季都可以享用的食物作为补充,稻米正好符合这种需要;长江流域虽然有普通野生稻,但数量比中心区少得多,自然状态的产量不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人工培植。也只有通过人工培植,稻种才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这两点在野生稻的中心分布区是不存在的,所以稻作农业的起源首先应在野生稻分布北部边缘的长江流域,这是对考古发现的证据的一种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通常被称为稻作农业起源的边缘理论。

稻作农业另一个重要的起源地应当在印度的恒河流域,那里的考古工作近年来也有了重要的进展。在恒河中游阿拉哈巴德附近的比兰河谷的一些遗址中,属于公元前第9千年至第8千年的中石器时代或原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只发现有野生稻标本,到公元前第7千年至第5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则发现了栽培稻,所以印度栽培稻的起源当不晚于公元前第7千年^②。尽管比中国栽培稻的起源晚些,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这个地方位于北纬25°以北,而野生稻中心区的北界不超过北纬24°,显然也是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地带。我个人认为那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起源中心,只不过它对后来文化发展的影响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大罢了。

大家知道栽培稻有两个亚种,即印度稻和日本稻,由于日本的稻作农业最早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中国学者则一般称为籼稻和粳稻。佐藤洋一郎通过DNA的分析研究了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关系,认为中国稻起源于普通野生稻,即多年生的 *O. rufipogon*,印度稻则起源于印度野生稻,即一年生的 *O. nivara*。而中国稻(或称为日本稻)本身又有热带与温带之分,热带日本稻是基本型,温带日本稻则是从热带日本稻分化出来的^③。不过有的农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 *O. nivara* 不过是从 *O. rufipogon* 分化出来的一支,中国也有 *O. nivara* 的分布,假如籼稻是从 *O. nivara* 培育出来的话,中国也具备这种条件,不能认为中国只能培育粳稻。张文绪则通过对稻谷稃壳双峰乳突的分析,认为中国古栽培稻是一个籼粳分化不明显的亚种,只是到公元前3000年才明显地分化为籼稻和粳稻。至于印度古栽培稻的情况怎样,目前还不大清楚。这些从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的不同结果尽管有些矛盾,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使得学术界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

再说陶器的起源问题。以往总以为陶器的产生首先是为烧饭之用,特别是为了煮那些不便于烧烤的小粒性食物,因而与农业的产生有关。但是后来发现西亚很早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日本很早就有陶器而没有农业,不能认为陶器的起源与农业的发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地方与农业的产生有关系,有的地方则与相对定居的生

活和集约的采集经济有关系,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陶器起源之后如果又有了农业,当然会促进陶器的发展,这也是为许多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至于人们最初怎么会想到用泥土来做陶器这一点,过去曾经有多种推测。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以为最初是用泥土涂在木制容器或篮筐上以免烧坏,后来发现单用泥土经火烧后也可以做容器,于是就发明了陶器。这是根据美洲印地安人用木制容器或篮子涂上泥土以做炊器的作法而做出的逻辑推论,并没有任何考古学的证据。

任何发明的成功,一是要有社会的需要,二是要有实现的可能。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中,许多人已经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实行集约的采集经济,有的地方出现了农业,需要有各种器皿盛水、烧饭和储存食物。早先用过的葫芦瓶等天然产品已经很难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设法寻找新的代用品。究竟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这需要长期的摸索。西亚、埃及和中国辽河流域一度用过石制容器,但因制作十分困难,用起来也不见得方便,以后就被陶器取代了。以往孩子们玩泥巴时会发现黏土搀适量的水就会变软,经过揉搓后可以捏成任何形状的东西;人们在烧火时也会知道泥土遇火变色而发硬的特性,在考虑制造新的代用品时会有人尝试利用这种特性,有意识地用泥土捏成一定形状再加以烧烤,陶器就会应运而生。每个地方的人民,只要条件成熟,都可能进行类似的试验而发明陶器,因此陶器起源的单中心说是不能成立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各地早期的陶器在制法、形状和纹饰上都有较大差别的事实。

陶器相对于天然产品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作为原料的泥土到处都有,极易取得;二是泥土有良好的可塑性,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器皿而不受原有形状的限制;三是泥土陶化的温度甚低,在当时完全可以达到。因为泥土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硅酸氧化铝,只要加热到摄氏 600°以上,就会失去结构水而陶化,应力增强,耐火耐水,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所以陶器一经发明,很快就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

陶器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过去我们只知道最早的陶器出自日本,例如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第 9 层的陶器,据测定为公元前 1 万年左右。当时有些人不相信,后来发现得多了,干脆单独划分出一个时期,叫做绳纹草创期。最近横滨市博物馆编的一本资料中,出土绳纹草创期陶器的地点遍及青森、岩手、宫城、山形、新潟、茨城、埼玉、千葉、东京、神奈川、爱媛、静冈、长野、福井、京都、福冈、长崎、熊本、宫崎和鹿儿岛,除北海道和冲绳外几乎分布在整个日本列岛^④。据说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公元前一万三四千年的陶片,但后者的烧成温度只有 400℃ 至 500℃,还没有完全陶化,是名副其实的土器。在日本之后,俄罗斯远东区的乌斯奇诺夫卡等许多遗址都出土了公元前 1 万年以前的陶片,蒙古也发现

了公元前 1 万年左右的陶片。近几年来在中国南方不断发现早期陶器,例如广西桂林的庙岩、湖南道县的玉蟾岩、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都发现了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的陶片或陶器,其中尤以玉蟾岩的陶器最为完整。玉蟾岩的年代如前所述,庙岩的陶片经过 ^{14}C 测定为 $13610 \pm 500\text{BC}$ 和 $13710 \pm 260\text{BC}$,江西两个遗址的年代数据比较分散,但大致与玉蟾岩和庙岩的差不多。在中国北方,继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公元前 9000 年至公元前 8000 年左右的陶器之后,又在阳原泥河湾附近的虎头梁这处一向被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年代远在公元前 1 万年以上。在印度恒河中游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公元前第 9 千年至第 8 千年的陶器,当时还没有出现农业。而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农业的出现比陶器早,同西亚和埃及一样有所谓前陶新石器。西亚最早的陶器不早于公元前 7000 年。

日本最早的陶器多属圜底,素面或饰隆起线纹、豆粒纹和爪形纹等。中国南方最早的陶器多圜底,饰刮条纹、绳纹或素面无纹,有的里面也有纹饰;中国北方早期的陶器为平底,饰浅绳纹、附加堆纹或素面。俄罗斯远东区的早期陶器多平底,素面或饰刮条纹,而西伯利亚南部的早期陶器则为圜底器。各地最早的陶器如此不同,说明陶器的起源是多元的。

假如我们把印度河和恒河的分界线向北延伸,把欧亚大陆分成两半,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边的广大地区,包括西亚、中亚、北非和欧洲在内,是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区,陶器起源较晚,一些地方有所谓前陶新石器。东边的广大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在内,是种植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区,陶器起源明显早于西方,有的同稻作农业一起出现,有的早于农业的出现。而且两边的人种也不相同,西边是欧罗巴人种,东边基本是蒙古人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分界线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以后一直继续到历史时代。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一时还说不清楚,但它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关于都市的起源问题,东方和西方也是不尽相同的,这里不拟进行比较,只谈东方,特别是中国都市的起源问题。近些年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属于公元前第 3 千年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认为是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起源的重要信息。这些城址大体可分为山东、河南、内蒙古、江浙、两湖和四川六组,除内蒙古有些山坡上的小石城为军事城堡外,绝大部分应是城邑,是区别于一般村落的新型聚落。这些城址中有的有大型宫殿式建筑或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的夯土基址用多人奠基,大致也是宫殿或宗庙一类礼制性建筑的遗迹。有的城址中有大量宗教遗迹,有的有手工业作坊,说明这些城邑应该是地区性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人口重新组合和相对集中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战争频仍的情况下,就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城池来加以保

护。但当时似乎也有不设防的城市,例如山西陶寺遗址有 300 万平方米,发现有石灰窑、石灰窖和用石灰粉刷的墙壁残块,残块上还残留有彩画的痕迹,说明这里有不同于一般住宅的礼制性建筑。陶寺的墓地极大,推测原有墓葬 1 万余座,说明这里人口相对集中。在已经发掘的 1000 多座墓葬中,大约 89% 的小墓没有任何葬具和随葬品,大约 10% 的中等墓有几件到几十件一般性随葬品,不到 1% 的少数大墓不但有棺槨和大量随葬品,而且随葬品的质量也明显比其他墓要好得多。说明当时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有的大墓中随葬大石磬、鼉鼓(一种用鳄鱼皮蒙的鼓)和龙纹彩盘等特殊器物,有人推测是王者之墓。因此陶寺也可能是一个都城遗址,只是至今没有发现城墙。有人认为这是它国力强大、边防巩固的表现。不论怎样,那个时期已经有了许多城邑,其中有的规模较大,面积达 20 万至 100 多万平方米,有的只有几万或十几万平方米,在分布上有成组的现象,因此不一定全是都城,也可能有等次、有联合,这需要搞清楚城内结构和城址之间的关系以后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有国家才有都城,龙山时代既然有许多都城,就应该有许多国家,是小国林立的时代。有人说它不像国家,到夏代才像国家,中国文明应该从夏代算起;也有人说商才算真正的国家,才是中国文明真正的开始。这很像日本的七五三论争,有人说 3 世纪卑弥呼女王时期就有了国家,有人说 5 世纪倭五王时期才有国家,也有人说要到 7 世纪日本律令国家的成立才算日本国家的正式开始。其实都是国家,只是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国家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第 3 千年的龙山时代。起源地区也不限于中原,应该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则是逐步走向多元一统的过程。由于中国文明在东方是最早发生的,发展水平也曾经是最高的,因而对东方各国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98 年 3 月 18 日

在中日共同举办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注 释

①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 年 1、2 期。

② B. K. Thapar,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India”, pp. 38–42.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UNESCO, Tokyo, 1985.

③ 佐藤洋一郎:《DNA が語る稲作文明》73,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6 年。

④ 横浜市歴史博物館等:《縄文時代草創期資料集》, 横浜, 1996 年。

The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Pottery and Cities

Yan Wenming

Today we invite archaeologists, agriculturists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ists from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uss the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pottery and cities. Thi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onc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issues have been well-studied, with many valuable publications and conclusions. Yet we've got new findings in these fields, which claim more exchanges, discussions and even re-examination. Present at this conference are leading researchers in these fields. I would like to have a few words as a modest spur for your valuable contributions.

Let's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Of the few grain crops that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s on human civilization, rice and rice agriculture were the earliest to be brought in to attention and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were drawn concerning its origin. However, we did not begin to touch the crux of the subject until the past ten to twenty years, after much controversy over conflicting opinions. A once popular view was that cultivated rice was originated in India, which was a direct inference from Russian botanist N. I. Vavilov's theory that the center of the gene variation implies the center of the origination. There were others who placed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 in southern China and Indochina Peninsula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wild rice and modern cultivated rice. Later, T. T. Cha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ice Institute in Philippine and Tadayo Watanabe from Kyoto University of Japan proposed that cultivated rice was originated in a mountainous zone from Assam, India to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eir view was commonly accepted. During the end of 1970s and the beginning of 1980s, a lot

of rice dated from 5,000 – 4,500 BC were found in Hemud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s well as sites of Majiabang and Daxi cultures. Hence the Yangtze River, particularly its lower reaches, wa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centers of the early rice agriculture.^① Soon after that, rice dated from a even earlier time, 7,000 – 5,000 BC, was found at the sites of Pengtoushan and Chengbeixi cultures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Valley. Since they were the earliest remains of rice agriculture known in the world, the Yangtze Valley was soon regarded as an origin place. The recent discoveries from Yuchanyan of Hunan province,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of Jiangxi province dated the rice agriculture to 10,000 BC. The C14 tests suggest that the charcoal and pieces of pottery collected at Yuchanyan can be dated to $12,470 \pm 270$ BC and $13,300 \pm 230$ BC respectively, similar are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two Jiangxi sites. It was a time even earlier than the cultivation of wheat and barley in West Asia.

Why did rice agriculture begin in the Yangtze Valley instead of in southern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where common wild rice was widely distributed? That was because the winter was comparatively longer in the Yangtze Valley and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food. People needed something that could last till the next spring. Rice was just the right thing. But there was little, if any, naturally growing wild ri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output was far from enough to meet the daily needs of the inhabitants. So people tried to cultivate it. Only through cultivation could the seeds survive the harsh winter and breed the next generation. These two essential conditions did not exist in the center of the wild rice region. Therefore rice agriculture began at the Yangtze Valley,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wild rice zon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s commonly known as the periphery hypothesis of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Another important origin was the Ganges Valley in India. Much progress was made in archaeological work there in recent years. At some sites in the Belan Valley near Allahaba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Ganges Valley, there was only wild rice at the Mesolithic or the Proto-Neolithic layers, which were dated to 9,000 – 8,000 BC. But cultivated rice was found at Neolithic layer, which was dated to 7,000 – 5,000 BC. Thus we can conclude that rice agriculture began in India before 7,000 BC.^② The lag of time,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Indian rice agriculture was propagated from China. In my opinion, the Belan Valley, another peripheral area of wild rice region – the center was set within the 24 degrees of latitude while that of the Valley